说明：

本人现在正在把旧作整理为一本书，暂定名为《毛泽东的智力缺陷》，包括三部分：1）诗人毛泽东，2）思想家毛泽东，3）国务家毛泽东（含内政篇与外交篇）。这三部分份量不均等，其中篇幅最长的就是《国务家毛泽东》，准备以在网上发表过的文稿作为整理基础。但愿今年内能整理完。

下文是《思想家毛泽东》的第二节，该章目录为：

一、毛泽东是思想家么？

二、毛泽东的知识、智力与性格缺陷

三、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误会
（一）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
（二）毛泽东的理想国
（三）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伟大理论
（四）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的知识、智力与性格缺陷

如所周知，毛泽东出生于前清，生长于当时信息闭塞、教育落后的湖南，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良好的教育。他终生不懂外文，熟悉的除了游民文化经典和各种稗官野史之外，不外乎传统经典、宋明理学、王船山学说、《曾文正公家书》那一套，外加长沙图书馆能找到的寥寥几本翻译拙劣的西学书籍以及各种报纸，彻底缺乏科学常识、现代文明常识以及外国政治文化常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常识。最严重的问题是，他有传统读书人的深重的井蛙情结，到死也未发现自己的知识残缺，对西方文化毫无兴趣，终生只看中国的书，认定那里面有解决一切难题的答案。就连长沙师范教的那点简单自然科学常识，他都毫无兴趣，门门不及格还引以为傲，在多年后向斯诺吹嘘，考平面几何时他在卷子上画了个圆，在下面题上“半壁见海日”。根据他的自述与旁人的介绍，不难勾勒出他的知识结构：

1）现代（＝西方）文明常识（含自然科学常识）：彻底阙如。

2）各种劣等低质旧小说：这构成毛的主要学习内容。

3）民国时代各地出的烂报纸：也是毛的主要学习内容。

4）儒家和道家的经典：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必读书。

5）《二十四史》：这构成了他执政后的主要学习内容，当然不可能读全，他反复

读的是《资治通鉴》。

6）介绍马列主义的二手小册子以及几篇马列的著作。主要是在延安时期看的，只限于哲学方面。59 年庐山会议后后似乎看过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他给毛岸英开的书单足可印证上述分析：

“精忠岳传 2，官场现形 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 4，高中外国史 3，高中本国史 2，中国经济地理 1，大众哲学 1，中国历史教程 1，兰花梦奇传 1，峨嵋剑侠传 4，小五义 6，续小五义 6，聊斋志异 4，水浒 4，薛刚反唐 1，儒林外史 2，何典 1，清史演义 2，洪秀全 2，侠义江湖 6。”

现代人必然要纳闷：毛为何会对那种毫无文学价值、思想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烂小说感兴趣，还要把它们当成太子的必读书？他当年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天天到长沙市图书馆去读书。那阵子的图书馆能有什么有价值的书？西方社会科学的作品都是后来才陆续翻译过来的。毛亲口承认，到延安之前，他只看过《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对马列一无所知。看来他把功夫全花到攻读各种各样的劣等章回小说和报纸上去了。毛认为报纸里有很多学问，花了大量时间把报纸的每个字都看过来，倒与今日的网虫差不多。他在《西行漫记》中还强调过读报的重要。左舜生也曾说过此事，对毛这种雅兴大惑不解。凡受过教育的人恐怕也不能理解：看报能学到什么系统的学问？

问题还在于，即使是在后来有了条件之后，甚至在他当了国、马列著作被大量翻译过来之后，毛仍然对外国人写的东西毫无兴趣。何方指出：

【“毛大概没有读过《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没有下过大功夫”，“喜欢读古书， ……曾经认为 ‘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 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2，123 页。有关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的说法，长期以来流传就较为广泛。不久前（2002 年 11 月 22 日）的一次会上，曾彦修还提到，田家英告诉他毛主席没读过《资本论》。于光远在旁加以证实说，他可算“权威”，因为他在延安时是图书馆主任。除人们传说外，毛在文章中也确未直接引证过《资本论》。《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提到“1954 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似乎不足信。因为插图的《资本论》只是写了个出版年代，难以证明读过。毛读书有作批注的习惯，更何况读《资本论》，但人们没见到过批注。和插图中的版本极相似的一本（可能就是这本）曾在毛中南海故居展览过，我参观时翻了翻，未找到批注。现在公开出售的毛泽东读书批注极多，大部系古籍，但也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和内部出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如果《资本论》读了几遍（1954 年是“又一次阅读”），那一定会有大量批注可供整理出版。而且像《资本论》这样大部头的书（加上《剩余价值理论》共六大本），毛恐怕不但没兴趣（“没味道”），而且也没时间读。在延安整风前学理论高潮期间，他钻研的是哲学，没参加《资本论》学习小组。此后大概更不容易抽出阅读的时间了。另据莫洛托夫回忆，毛向他承认，自己没读过《资本论》。见（苏）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3 页。）

毛对中国古籍百读不厌，但对通行于世界的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理论一类书却读的不多，对外国文学更没多大兴趣，很少读什么世界名著，据说只读了《毁灭》、《简¨爱》两本外国小说，《红与黑》还是只看电影没看原著。但他对中国古籍读得多，记忆力又好，许多古文、诗词，可以倒背如流。所以有人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 307 页。） 他在讲话中经常以古喻今，可以长篇引证原文，顺手拈来，毫不费力，但从未见他引证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大本原著上的话。有人统计，《毛泽东选集》中引用中国古籍比马列（又以斯大林为最多）要多出四倍。他不但自己爱好古籍，还经常挑选一些古文叫印发给中央领导或某个会议参加者看，如《后汉书》的《张鲁传》、枚乘的《七发》等。有时还要考问一些领导人，《资治通鉴》看了几遍？直到临死前还要人给他念庾信的《枯树赋》、贾谊的《口鸟赋》，以及岳飞、张元干等人的词（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2-405 页）。 】

其实毛自己就承认他不学有术，根本不懂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他说：

“华北座谈会后，也想搞点马克思主义。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任弼时加的；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了几本书，很感谢他。德波林的《欧洲哲学史》，就是打水口期间读的。原来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东西。两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所谓华北座谈会是 1945 年 2 月至 7 月间，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后，在延安同时召开的一个会议，历时 43 天。因此，毛所谓“华北座谈会后”，当然只能是七大之后。如所周知，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当成了全党的指导方针。刘少奇在《论党》中强调指出：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

在荣任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才想起来“搞点马克思主义”，无乃太晚乎？这算是什么笑话？

有趣的是，“反对经验主义”乃是延安整风的口号之一，与“反对教条主义”相

辅相成，周恩来等人就是以此罪名被整肃的，刘少奇在上引语录中也指出了“反对经验主义偏向”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特点。然而任何一个稍懂哲学的人都知道，所谓“经验主义”根本不是毛说的那个意思，正如毛反对的“自由主义”与真正的自由主义八万竿子打不着一般。

更可笑的是，后来毛生吞活剥地看了点哲学书，自己也发现弄错了，在庐山会议上说：

“如任弼时讲的，说我是狭隘经验主义，我就不承认。你如果承认，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并不是这样理解的。不懂得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就是列宁批判马赫的，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此书反对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悲观失望。1905 年党涣散，列宁自己长期研究多少年，才写出来的。因为理论基础不一致。”

可怜的是，即使在看了列宁的那本书后，他总算明白“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是错的，却仍然没本事搞明白经验主义的概念，以为马赫主义囊括了经验主义的所有流派，而且它们都是唯心论！

好在那时他还比较诚实，坦承自己不懂理论：

“我也不懂多少理论，不是教授，只是知道一些。教授要读很多书。我书读得少，是些什么意思，大体懂一点。如杜威主义不懂，太复杂，简单意思懂一点。柏格森主义、无政府主义、唯心论、哲学史，看过一些，没有作过深入研究。看书和研究是两回事。冯友兰有研究，才写出《中国哲学史》。看了，不等于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你并不清楚，即基础不懂。根据这个基础的另外一些学问，也就不了解。”

连杜威主义那么浅显的玩意都看不懂，觉得“太复杂”，这种理解力，能看懂康德、黑格尔的书么？而不懂他们的学说，又怎么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怪不得他不喜欢看理论书，因为“太硬”，超出了他贫弱的理解力：

“我也如此，读书少，后来养成读书兴趣，一拿就是历史、小说、笔记，这些较柔和。理论书太硬。《政治经济学》我就没读过，陈伯达也没有读过。要养成读书习惯，各种书都读，包括文学、历史、法学、心理学、李森科、摩尔根。”

历史书既然“较柔和”，在他的理解范围内，那应该起码把国际共运史、十月革命史、联共党史等等仔细看过来吧？否则怎么去“继承捍卫发展”列宁主义？然而他就有本事闹出这种笑话来：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

啊！（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

他这儿披露的马克思多次预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到来的独家消息，本人无学，不知道是否属实，只记得马克思强调过，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容许生产力发展的余地，无产阶级革命都不会爆发。至于毛披露的苏俄革命史则完全是笑话。列宁一开头确实想和平夺权，鼓吹"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那并不是"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而是因为党内大多数人都主张与孟什维克合作。哪怕在他提出准备武装夺权后，多数党魁仍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不成熟，支持他的只有托洛茨基。他确实是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以为只要俄国打响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枪，欧洲先进国家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就会跟上来。直到死那天，他都"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盖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取得完全胜利是无法设想的"，从未提出过"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那是斯大林的发明，也是忠于列宁思想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争吵的核心问题之一。毛这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竟然连斯大林的贡献是什么，其与托洛茨基"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什么都两眼一抹黑，绝对是只有中国才会闹出来的笑话。

少奇同志也够呛，他毕竟去苏联留过学，大约恍惚听到过"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是斯大林而非列宁的主张，于是出来纠正老毛，说列宁说的是"一国可以胜利"，什么胜利？当然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姑不说上引列主席语录已经表明，列主席认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是世界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单独取得胜利。就算列主席没这么说过，那请问"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与"社会主义建成"究竟有何区别？莫非可以有社会主义革命业已取得胜利，而社会主义尚未建成的怪事？当然，如后文将要解释的，这是列宁和斯大林修正马克思主义造出来的悖论，须怪不得少奇同志。比起伟大领袖那马列盲来，他可算精通马列了。

由上可知，毛泽东的知识结构有着非常醒目的特点，那就是极度"偏科"——彻底缺乏西方传入的一切知识，而对旧文化包括显性文化（儒教经典、史籍等）与隐性文化（亦即游民文化经典、稗官小说等）则极度精通。这种极度畸形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绝无可能理解建筑于对西方社会的剖析之上的马克思主义，但却丝毫不妨碍他掌握列宁、斯大林发明的革命工艺学。那并不是什么复杂抽象的理论，也不需要对西方社会和文化有任何了解，无非是如何建立党组织，利用它去发动、组织、控制群众，将民力化为夺权战争资源，并加以极限开发利用。上面已经说了，这套政治技术可以从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独立出来，不必非得学会马克思主义才能掌握，由苏联顾问和留苏学生们的言传身教即可。但它只是干革命的基本手段，并不能解决具体的战略战术问题，后者只能用中国传统的阴谋诡计去解决。

这就是毛泽东与与国际派"教条主义"者们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虽然从莫斯科

“背回来几大麻袋教条”，却不懂国产阴谋诡计。而毛的长处就在于他通过阅读史书、烂章回小说、烂报纸，对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心理和性格上的弱点极度熟悉，知道该怎么去最有效地利用它们。在掌握列宁发明的基本革命技术后，再加上对传统阴谋诡计的娴熟运用，当然要构成极大主观优势，使得毛在党内外权力斗争中胜出，最终赢得了中共革命胜利。这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真谛，它说的其实是“把列宁发明的革命工艺学与中国原有的造反打天下、整人控制人的阴谋诡计结合起来”，从头到尾都与马克思主义委实没有什么相干，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毛的病态知识结构在病态社会中的歪打正着。

正因为毛的畸形知识结构在革命战争中帮了他的大忙，而国际派背回来的几大麻袋教条什么用处都没有，毛才养成了对西方文化的轻蔑心理，甚至数典忘祖，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他的确是任弼时说的“狭隘经验主义者”，终生无法从自身的成功经验中超越出来，没有看到在成功夺取政权后，他面临的不是传统开国君主“坐江山”的快活岁月，而是全面改造中国，将中国建设足以领导世界革命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他解放全人类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才是仿效斯大林晋升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正道。而实现这一远大理想的秘方，从《精忠岳传》、《官场现形》、《子不语》、《兰花梦奇传》、《峨嵋剑侠传》、《小五义》、《水浒》、《薛刚反唐》、《儒林外史》、《何典》、《清史演义》、《洪秀全》、《侠义江湖》一类垃圾读物中是绝无可能找到的。

这就是他何以会在当国后无师自通地获得狗杂种石破天（参见金庸《侠客行》）那伤人于无意之间的毒掌神功，无论什么东西，碰上了都非死即伤。他非但悟不出，不懂西方专家治国那套，就绝无可能让中国成为现代强国，而且就连两千年前的贾谊都不如，始终没有看到“打天下”与“治天下”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智能——“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打天下需要的是“诈力”，而治天下则是顺势权变，“务在安之”。毛却以马上得之，以马上治之，正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师古”，终生以诈力经营天下，比项羽也高明不到哪儿去。

要练就这毒掌神功，除了知识结构残缺畸形外，还需要醒目的智力与性格缺陷。人的智力有各种定向。毛是非常罕见的造反天才，精通各种匪夷所思的整人控制人的阴谋诡计，却是更罕见的治国白痴，彻底缺乏建设性才能。这儿的“建设”是广义的，并不光指经济建设，而是包括建立思想体系、制定各种可运作的制度的智能。这就是毛最突出的特点，它是由一系列智力缺陷决定的。

毛的第一个智力缺陷深符民族传统，只是他把它推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那就是彻底缺乏抽象思维能力，不懂逻辑思维，没有起码的论证能力，只会以比喻代替，甚至没有准确的表达能力，因而没有创建构筑理论体系的能力。他不但能用“人必须长个屁股”去论证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更有本事从“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按：他忘了下雨刮风的时候）”的自然现象中，推导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政治学、社会学上的一般性结论；以人必须有头，来证明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奉苏联为头（大概咱们是任老大哥坐的屁股）；以“月经”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大概西方现已进入“今年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定准”的更年期，而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则刚进入“早知潮

有信，嫁与弄潮儿”的青春期））；以农民锄草肥田的例子来证明镇压学术界异端的必要性；以“种牛痘、打预防针”来证明“引蛇出洞”、诱骗思想犯自动暴露的科学合理。无论怎样倒行逆施，他总是能找到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论证它的合理性。

最有趣的还是，1957 年他去莫斯科开会，苏联大使、哲学家尤金陪同前往。在飞机上，他与尤金有这么一段对话：

“毛主席笑笑，接着又问：‘你说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尤金一个劲眨眼，终于作难地叹道：‘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考住了？’毛主席将下唇吸入嘴里轻吮一下，笑道；‘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妙，妙！’尤金抚掌喝彩，‘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这种“思想家”，绝对只会在文盲国家出现。毛泽东号召“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那阵子，报上登的据说是工农兵写的学习体会，全是此类货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的这一智力缺陷，反而成了他强大的主观优势，使得毛泽东思想获得了巨大的感召力，俘获了千百万工农群众，让他变成众望所归的人民导师。似乎可以说，国际派败在毛泽东手下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们从莫斯科背回来的几大麻袋教条根本不是毛泽东形象生动的市井比喻的对手。李德观察到：

“他（毛）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就连他那句关于红辣椒的格言（芦注，亦即“爱吃辣椒者最革命”）也是随形势而变化的。在云南时，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志是生鸦片，因为当时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不是银洋而是鸦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标志是虱子，在那里我们几乎让虱子给吞吃了。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这种“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当然很了不起，然而从思辨的角度来看却一钱不值。可悲的是，愚昧的国情，使得毛的话语成了亿万人民狂热背诵的圣经，却没有人意识到它们是何等弱智。例如在文革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被亿万人民反复背诵，然而却没人能看出，毛连构建理论必需的起码的准确表达能力都没有。若那弱智表述能成立，则敌人反对自杀，我们就要拥护自杀，敌人拥护吃饭，我们就要反对吃饭，这是什么疯话？他本该说：“凡是敌人怕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一定要去做；凡是敌人希望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决不能去做。”简言之：“不能干亲痛仇快的事，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如此简单的道理都没本事说明白，您说有治没治？当然，更绝的还是“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请问“五十年内外”难道不覆盖“一百年内外”？

因此，毛泽东的思想家身份是惊人低下的民智玉成的。当代网络写手樊弓（美国数学教授）、林思云、“随便”与“鲁肃”（据说都是理工科学者）的名作表明，中国识字分子们不懂逻辑推理论证，只会使用“比喻推导”或“比喻证明”。例如樊弓教授曾用一元二次方程有两个解来证明暴力革命可以有不同途径与结果，用李四去赴张三的宴途中被劫匪杀害来证明八九学运领袖毫无过错，用警察对飙车者罚款证明独立知识份子不能批判伪民运，用他本人的汽车陷入泥潭、有人前来帮助推出证明“伪善也是善”，而批判伪民运就是“人格谋杀”；林思云用好莱坞电影上舍身炸毁陨石的英雄事迹证明“他们的正义不是我们的正义”，劫机撞毁世贸双楼的恐怖分子是英雄，从鸭与雁的行为不同导出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族性格区别；随便用“鱼用腮呼吸，鸟用肺呼吸”来证明中国人与美国人是不同物种，因此决不能“像狗一样地跟着外国人走”，建立民主制度；而鲁肃用“物体的当前位置并不决定运动方向，x 的值并不决定 dx 的正负”来证明“民运那帮人显然并不打算做全民一统的教育”。这些写手的政治立场与观点各不相同，然而都一无例外地赢得了网民的狂热喝彩。若非芦某指出这些比附之荒唐，则到今天也无人能看出它们是何等拙劣的智力笑话。当代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外华人读者尚且如此，而况上世纪 20-70 年代的文盲工农乎？

毛的第二个突出的智力缺陷也富有中国特色，那就是模糊思维。这原是敝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毛把它推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成了“空洞思维”，也就是只有模糊零星念头，却毫无具体思想内容。因为毛有不同身份，他这个智力缺陷也有三个不同层面的反映。在所有方面，他都是标准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作为思想家，他的“理论”是惊人的空洞。凡过来人都知道，伟大领袖一生就做了两件事，其“平生得意之笔”便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据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实践，目的是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派，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整整十年，官方媒体什么也没干，就在吹嘘这套名堂。但那伟大理论到底有些什么内容，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走资派”，判据是什么，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各自有些什么内容，谁也说不上来。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未见过如此空洞无物的“理论”。

作为政治家，毛的这一智力缺陷使得他彻底缺乏制度发明能力与设计能力，他是极为罕见的终生革命家，永远不安于现状，永远被破旧立新、改天换地、创造奇迹的强烈冲动煎熬，但有的只是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朦胧憧憬与渴望。至于那理想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儿，他脑袋里只有一团雾，漫说是具体的蓝图，就连个草草的粗线条勾勒都没有。

这就是文革为何会变成毛平生最大的尴尬，彰显了他那硕大的脑袋是何等惊人的空空如也：毛在发动文革时手订的《十六条》规定，文革的任务是斗批改。1967年“一月风暴”中，亿万民众响应他的号召，起来推翻了“官僚主义者阶级”，把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了过来。至此，官僚集团的抵抗已被粉碎，场地已经腾出，“破旧”的“斗批”任务业已顺利完成，下一步便是“立新”的“改”了，万众

翘首，专盼毛下场挥毫，在那张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写上最新最美的文字，把他脑袋里的太平天国搬到世间来，化为具体的可靠的社会制度，以确保他的革命路线能被一代代接班人不走样地传下去。然而毛翻出口袋底来却什么也没有，吭哧了半天，最后只能推出个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来应付过去。就算那“新生革命政权”能实际运作，那也不过是改朝换代的权力斗争，毫无实现革命初衷的社会制度改造内容。一言以蔽之，他极度精通如何砸烂一个旧世界，却丝毫不知道怎么建立一个新世界，“专拆不盖”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作为国务家，他只会提出某个战略口号，给全党或全民指出努力方向，却从来没有制定实现那目标的具体规划、方案与步骤的能力。《论十大关系》就是最典型的范例，那文章似乎面面俱到，什么都考虑过来了，可惜只是典型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盖他说的只是应该统筹兼顾那些关系，至于怎么才能达到那目标，不知道的人看了还是一无所知，因为连作者本人都不知道，因而完全是废话。当然，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比起来，那还算好的了。

因为这些严重的智力缺陷，毛这种政治家和国务家其实是“口号家”。他的专长，还是在每个历史阶段及时提出一个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口号，诸如“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等等。这其实是他从“始皇帝死而地分”、“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迎闯王，不纳粮”等无数先例学来的，在战争期间当然有巨大威力，但在和平时间用来治国就是笑话了。虽然威力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智力角度来看，他与部队行军中的快板鼓动员、球场上的啦啦队毫无区别。

从这些事实立即便能看出斯大林与毛泽东智力水平的天壤之别。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乃是人类最大胆的实验，毫无先例可供参考，完全靠实验家们自己去摸索，而这是对他们的想像力、创造力特别是制度设计能力的严峻考验。不管怎样冷酷无情，斯大林毕竟还是设计出了一整套完备的制度，发展了列宁的建党理论，卓有成效地将党改建为一个全能的权力组织网络，把全民不留孑遗一网打尽，牢牢攥在如来佛掌心中，造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崭新的极权社会，还发明了史无前例的“计划经济”。这种技术发明能力，何尝在毛泽东身上见过丝毫？

这些智力缺陷，决定了毛永远需要一个教师爷，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为他拨正船头，指引航向，在他当国后为他提供建国蓝图，让他照图施工。而这就是斯大林死前的实际情况。中共执政前，所谓“毛泽东思想”中毫无原生货。“民主革命三大法宝”（建党、建军、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统统来自于苏联。苏维埃革命不必说，就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为我党制定的，而那其实来源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permanent revolution，其中一个教义便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

我已在旧作中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内容其实是从张国焘

那儿剽窃去的。张和毛泽东等人在草地的重大争执，便是张认为苏维埃革命不符中国国情，业已失败，应该改搞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张还提出当务之急是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与 1935 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为中共决定的策略改变暗合。中共在抗战爆发后终于放弃苏维埃革命，声称愿为三民主义奋斗，也是莫斯科施压的结果，并非毛的主动。相反，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力主杀蒋，甚至隐瞒斯大林的来电，给张学良发电，敦促他 “干到底胆大些”，“要赶快消灭敌人”，让周恩来说服张学良对蒋“行最后手段”。若不是莫斯科的干预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则中共就算不被何应钦的讨逆军消灭，后来也根本就没有上台的希望。

纵观整个所谓“民主革命”时期，毛唯一的独特贡献，就是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然而那是从施耐庵那儿学去的，并非原创。何况毛最初也曾热衷攻打过大城市，只是在失败后出于生存本能，全靠对马列基本理论一无所知，受游民经典的指引，才走上了水泊梁山。他的心路历程，与陳士榘说的那些文盲将军受《水浒传》感召上山落草完全一样。将之提升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则是文人后来为他干的活。

建国初期就更不用说了，中共开头完全是按苏联模式，亦步亦趋地实行“爬行主义”、“奴隶哲学”，不敢稍越雷池一步。整个国家的体制不必说，就连毛最初确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究竟需要多长时间，也是按苏联经验忠实拷贝下来的。

当然，作为有志于接替斯大林充当全人类导师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在学徒期间，伟大领袖也曾有过创新冲动，试图在列宁ー斯大林发明的权力框架之外“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据师哲披露，1949 年米高扬秘密访华期间，毛曾向米披露了他的创造灵感：

“当毛主席讲到群众团体特别是青年问题时，着重介绍了我们的青年政策，说我们要建立三个青年组织，青年团、民联、学联。米高扬不理解为什么要分三种组织，就说：‘这不是太分散了吗？这样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会不会闹矛盾？’

主席一听，很不高兴，有点发火：‘你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青年？我们有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青年、社会青年等等。中国青年的人数比欧洲某些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的多，你怎么能把他们都统在一个团里呢？’

米高扬本来就声称他只带了耳朵来，这一来，他就更不插话了，只是听。”

从这段轶事足可看出毛的思维是何等混乱——既然中国人那么多，不能把所有的青年都统在一个团里，那为何又能把更多的人民统在一党专政之下？难道中国人口数没有超过欧洲总人口数？更有趣的是，他连“权力组织”与“职业行会”都分不清，甚至似乎以为青年分为工人、农民、学生、无业人员（所谓“社会青年”）是中国特色，苏联没有，因此有必要在中国按行业设立不同的青年组织，以进行“归口领导”，实行他后来在文革中批判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这种昏话出自一个终生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共党政客之口，真不知道米高扬听了作何感

想。老米不过是个二流政客，然而其思路之实际，令毛那个妄想家黯然失色。如所周知，毛的这个“有所发明”并未化为现实，中国的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青年、社会青年等等全按苏联模式“统在一个团里”，什么“民联”、“学联”压根儿就没听说过。学生会倒是各校都有，不过那跟工会一样，只管发电影票组织舞会，从来不是权力组织。大约毛后来也发现那设想完全是搞笑，必然要引出米高扬预警过的问题，因此最后还是乖乖回到了师父划定的框框内。

直到 1956 年苏共开 20 大，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毛才解放了思想（这是他亲口承认的，只是后来他发现扔掉斯大林主义那把刀子后果严重，才转过来批判赫鲁晓夫），发现原来斯大林主义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苏联模式原来也有弊病，特别是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农业残废（这其实也是苏联人自己披露的，并非毛的发现）。这结果便是《论十大关系》出台，毛觉得自己业已出师，要踢开师父干革命，搞自己的一套了。

可惜他不知道那一套究竟是什么东西，于是只好请出“人民上帝”来做他的西席老夫子。在这点上，毛与列宁和斯大林截然不同。列宁直接就认为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掌握马克思主义，需要知识分子组成的“先锋队”从外部灌输进去。布党是“民之主兼民之师” ，群众只是被布党严密控制并被极限开发利用的人力资源。而毛泽东确实真心诚意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首次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以为群众的“集体智慧”会为他源源提供创造灵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彻底缺乏创造力与想像力，因此不得不请“群众先生”代他去解决一切难题，从请群众代他煮“无米之炊”，绕过原始资本积累的难题，去实现工农业大跃进，完成国家工业化，到请群众去代他设计、建立起一个与苏式国家不同、人民群众真的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这种“以民为师”的“民粹主义”，不但未在马列先辈中见过，在人类社会中也从未见过，它引出的灾难性后果，当在有关章节介绍。

毛的第三个严重的智力缺陷，是“见叶（还不是木）不见林”的高聚焦隧道眼，也就是他反复兜售的“纲举目张论”。他反复做过解释：所谓“纲”，就是渔网的绳子，所谓“目”，就是网眼，一提那绳子，所有的网眼就都张开了。据说人主治国，要做的就是全力去找那根绳子，找到后再令全民去“拔河”。此所以毛为何要先后“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还在《矛盾论》里作了“学术”解释，据说，那“纲”是所谓“主要矛盾”，而“目”则是次要矛盾，只要全力抓住那个主要矛盾并解决之，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不幸的是，他一如既往地忘记了解释其原理何在。

毛泽东此论，乃是最典型不过的“狭隘经验论”，亦即从个人经验中提取出一个普适的“宇宙运行规律”。毛的智力活动主要局限于“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不是搞定党内外的人事关系，斗倒整垮政敌，建立对所有人的严格控制，便是指挥战争，而这两种智力活动都会诱导出“纲式思维”。前段《凤凰网》的《口述历史》节目播放了该台对杜月笙故旧的采访，那人说，杜月笙搞定江湖人事也是靠这一手——找到最关键的那个人，一提那个“纲”，整个网就起来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而在两军交战时，找到并突破对方阵线的最薄弱点，则敌军也会全线溃败。

毛就是从这些狭隘经验中，发现了这个“宇宙运行规律”，把它用为治国之道，在影响事物的诸多因素中，把最显眼的那个单单挑出来，再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倾全力而上，去解决那“主要矛盾”，却忘了斯大林总结的辩证法的第一条规律:“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这种隧道眼(tunnel vision，亦即管状视野缺损，病人看到的世界似乎是从一个隧道里看出去的）的聚焦度之高，人类有史以来，未之见也。其具体应用将在“以钢为纲”的章节中详论。

毛泽东的第四个严重智力缺陷，是没有“可行性”概念。这似乎也是中国的传统之一。古人留下来的策论，似乎只作必要性论证，也就是只论证采取某策会有些什么好处，但一般不作可行性论证，反正我记忆中看过的那许多“疏”中（《治安疏》、《论贵粟疏》等等），似乎从不对其政策主张作可行性论证，提示古人没有这一观念。最典型的便是清廷关于是否严禁鸦片的廷争,林则徐支持黄爵滋“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将一年内无法戒断的烟鬼统统处死的主张，两人都论证了采纳那主张的必要性，却只字未提其可行性，而那明摆着是不可行的。如此重大的疏忽都会发生在一个著名的能员干吏身上,得到了清流们的一致欢呼,而且还被朝廷采纳，似乎只能用古人缺乏可行性观念来解释。

这种智力缺陷，到毛手上便达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不是像古人那样忽略了这个问题，而是干脆否定了世上有不可行的事存在。大跃进的几乎每个口号都反映了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巧妇能为无米之炊”、“敢想敢说敢干”、“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哪怕是大饥荒也不曾动摇他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60 年代他命令全国学习的大庆经验中，主要的一条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其实就是“有无条件都要上”。发为诗歌，便成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一切具有可行性观念的人，而毛最讨厌这种“泼冷水”的人。记得《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收集了一篇毛在反右前的讲话。他畅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文化出版事业的宏伟设想，说了一大通，某位出版业负责人却出来说，现在纸张供应很紧张，主席说的这些可能有困难。毛当即斥道：大家在这儿谈得热火朝天，你却出来说没有纸，真扫兴！

因为否认世上有不可行的事，把整肃有可行性观念的人当成“路线斗争”，毛才会作出在现代人看来是荒谬到匪夷所思的发明，诸如没有矿石也能炼钢，将暴民造反制度化，以为那可以化为国家运转常态等等。毛这种“打破框框条条、清规戒律”的英勇努力，将在有关章节中具体介绍。

毛泽东的第五个智力缺陷不是天资限制，而是人为造成的。他本来就没有逻辑思维习惯，却不幸迷上了“辩证法” 的野狐禅，而且真诚地坚信哲学是“万王之王”，是统治管领一切学科的“总学科”，套用项羽的表述，那不是“一科敌”，而是“万科敌”，套用韩信的表述便是“将将之学”，其实也就是他最爱拉的那根“网绳”(纲)，是他“外行可以而且必须领导内行”的本钱，相当于传统社会的《四书五经》，学好了便能当上无所不能的父母官：督促百姓完粮纳税，平冤决

狱，治理黄河，领军打仗，等等。他对所谓“对立统一规律”的迷恋，彻底摧毁了连庸人都有的常智，使得他非但看不出事物的本质来，而且专干自相矛盾的事。

例如他是个极罕见的毕生革命家，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激情永远在胸膛里沸腾，却到死也弄不清革命是怎么回事，不明白人们为何要干革命，更不明白任何有成果（achievement，中性词，并不一定是好的成果）的革命，都必须由“自下而上的革命”与“自上而下的革命”两个阶段组成。

人们之所以要起来干革命，除了少数野心家外，大多数革命志士都是因为觉得旧制度太不合理，太黑暗，想建起一个新制度来代替。在此，砸烂旧世界不是目的，建设一个新世界才是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先得把受旧制度压迫剥削的人民发动起来，把政权夺过来，这就叫“自下而上的革命”。但夺取政权虽然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列宁语），却不是革命的目的，改建社会、实行新制度才是革命的目的。为此，革命党人在夺取政权后，便充分发挥政权的强迫功能，实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把他们原来设想的那个理想制度翻译兑现为社会现实存在，这就叫“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个过程只可能是自上而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统一与协调。此所以列宁每到要干革命前就得先去写本书，那就是“先设计，后施工”，其实是他从欧洲学去的传统。

当然，实际的革命过程，必然是个机会主义（opportunism，此处用的是西方的意思，并无褒贬之意）的过程，也就是革命领袖见机行事，临机应变，摸着石头过河，绝无可能如机械工程一般，造出完全符合原设计的机器来。例如列宁在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与他在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中的设计蓝图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然而这机会主义的时时修正，并不能否定革命后的社会改造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上面已经说了，任何一个工程，无论是社会的还是机械的，都只有靠自上而下的指令才能完成。

换用常见的表述：革命只能夺取政权，不能改革社会。社会的改革只能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强迫命令完成。革命家与改良家的区别，只在于后者认为可以利用现政府，而前者认为改良的使命只能由新政府来完成。

毛泽东却连这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他当然是个毫无原则、出尔反尔、权欲薰心、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无耻政客，但同时也是个罕见的理想主义者，永远为改天换地的激情煎熬。可惜他始终不明白：你可以依靠群众去完成革命的前半截任务，但你绝无可能指望他们完成后半截。那社会改建工程蓝图必须由你提供。如果你什么蓝图都没有，就把他们轰起来造反，指望暴民在夺权后靠布朗运动便能somehow 建起个符合你的理想的新社会来，那革命就绝不会有任何成果，只能变成无休止的波澜壮阔的蠢动，而这就是文革的实际过程。

这本是任何庸人都能看出来的事，毛泽东何以无法明白？那是因为他竭尽一切努力，高效摧毁了自己的天资。他的“辩证法”告诉他，本质相反的事可以互相转化，因此，大乱必然转化为大治，越乱越治，如果乱得史无前例的结棍邪乎，则乱出来的那个世道也就是无比完美的太平天国。

您说这是什么疯话？然而 believe it or not，他是真诚相信这鬼话的。不仅如此，全国识字分子还无比坚定地跟着他相信这疯话。任何一个过来人都能为此作证。即使不是过来人，去看看毛的著作与讲话也就够了，那里面全是这种疯话。在他，乱治转化不但如牛顿的苹果落地一般，是一个自动发生的必然过程，而且互为前提，这就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高深道理。既然如此，那当然是“不乱不治，不治不乱”，如欲救国，必先祸国；如欲祸国，必先救国。这其实不是他的原创，是从老子“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之类教导那儿来的。

这就是他为何会发明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治国之道来，连暴民造反必然影响生产的常识都要否认。我记得他主持制定的指导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与指导文革的《十六条》，似乎都把“生产上去了”当成判断各单位运动取得胜利的指标。四清运动毕竟还是严格受控的运动，造成的恐怖气氛确有可能会极大地焕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起到“促生产”的作用，然而若认为文革那种暴民造反能促进生产发展，那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脑袋了。

笃信“辩证法”，使得毛泽东专干南辕北辙、缘木求魚的事。上面已经说过，苏共 20 大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政治局批判了斯大林，解放了毛的思想，他得知了苏联体制的毛病，那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得国民经济严重失衡，于是写了《论十大关系》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强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那就是说，要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虽然他没有能力明白说出这点，更无能力指出达到目标的方法，但毕竟还是个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可惜不久后他急于当世界领袖，使用“纲式思维”找到了富国强兵的秘诀，下令全国人民都去当炼钢工人，这与他先前的主张完全相反。然而他立即便使用那万能的“辩证法”作了合理性论证，那便是“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其实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失衡才是常态，达到平衡并非常态”。这疯话连田家英、李锐那些知青都无法接受，郑重其事地从哲学上去驳斥。其实何必如此？若是这伟大道理能成立，那当初毛又何必写《论十大关系》？即使是古巴那种实行单一经济的国家，也不曾让所有的人都改行去种甘蔗。

这就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实质——专用炼钢转炉烧制冰激凌，把绝对无法调和的事熬在一锅里，妄图造出一个“冰火岛”式的地上天国。上面已经说过，他唯一学会的外国把戏（不是西方把戏，是俄国把戏），便是建立一个把一切权力与资源都垄断在自己手里的政党，然而在他藉此取得夺权战争的伟大胜利、并用一连串的整人运动把全民改造为党的驯服工具之后，却又去追求实现与手段截然相反的美好理想，声称：“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为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却又强调“一元化”，痛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最终使得国家陷入他本人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收拾的莫名其妙的混乱中。

除了上述智力缺陷外，毛的一系列性格缺陷也同样醒目，同样对他练成毒掌神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一个性格缺陷就是他的自我期许太高，自尊心与自信心超强，彻底缺乏自我完善能力。这与斯大林有显著区别。斯大林虽然是个人崇拜的发明者，自我期许也非常之高，自尊心与自信心也同样超强，但并未因此失去自我完善能力。他特别强调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多次引用列宁的有关语录告诫全党。他本人也确实能从重大失败中汲取教训。苏联卫国战争的过程，也就是他不断吸取失败教训、战胜自己的过程。他从战争初期刚愎自用、实行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逐渐转变为尊重内行，学会听取专家意见，克制急于求成心理，耐心等待决战时机成熟，最终成长为称职的最高统帅。似乎可以说，如果斯大林没有战胜自己，完善自己的战争知识与技能，则苏联也就不可能战胜德国。

毛泽东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前面已经说过，他终生是个狭隘经验主义者，永远陶醉在既往的成功里，把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当成了放之万事而皆准的宇宙运行规律。“故步自封”这个成语，好像就是老祖宗特地为他发明的。他既不承认有学习现代文化知识的必要，认定中国古籍里有解决一切问题的秘方，又毫无勇气承认失败并从中总结教训，丰富扩展自身的经验积累，于是便永远冻结在延安时期，再也无法长大了，其内心世界由少得可怜但无比坚定的几条信条组成：人民是上帝，只要感动了他们，便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出来；哲学是万王之王，只要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便是“抓住了牛鼻子”，就获得了外行领导内行的智识资格，能指导全民把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等等。所谓大跃进就是这两个信条的物化，然而它的惨败却没让伟大领袖学会任何东西，除了让他记住“民以食为天”，提出“以粮为纲”，要农民把果树砍了，鱼塘填了，改种庄稼之外，他的基本信条毫未动摇，什么都没学会。

因此，在全民刚从死亡的深渊挣扎回来后，他立即又交给他们更复杂的社会改建任务。不仅如此，在九大开过之后，大跃进那套政策又在各地在不同程度上死灰复燃：什么大会战，什么“以钢为纲”，什么“教育革命”等等又冒出来了。如果不是林彪事件再度使得派仗爆发，国家重新陷入混乱，只怕大跃进又要以全国规模兴起，再度重创国民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救了中国。“阶级斗争”的祸害，无非是让一部份人民遭到歧视、迫害、虐待、批斗、毒打甚至枪决，让其他人趁机不必上班，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但它毕竟不能像大跃进那样，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摧毁工农业生产，引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

毛泽东这个毛病，越到暮年便越严重，不是反复扳着指头数“十次路线斗争”，宣扬他“与人奋斗”的赫赫战果，完全成了个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就是越发钻进故纸堆里去，“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把两千年前的原始人法家当成现代人的效法榜样，责令全国人民“评法批儒”，最后甚至把宋江那个虚构的古典小说形象当成近现代才有的“修正主义”者（“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下令全国人民去把他批倒斗臭！这时空倒错之宏伟壮丽，令人不能不纳闷他的脑袋到底出了什么怪诞毛病，连王莽的复古都瞠乎其后。

虚荣心超强，使得毛泽东没有接受甚至面对失败的道德勇气，于是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用更多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原先的错误，便成了他施政的主要关心所在。在这点上他连斯大林都不如。斯大林当然也文过饰非，更善于寻找替罪羊，但他

毕竟知道国家领袖和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二战本是希特勒和他联手发动的，但后来希特勒突然翻脸进攻苏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苏军一溃千里，在战争头 5 天内失去的领土就超过了尼古拉二世在两年间失去的领土，战争头半年内就损失了 6 百多万将士。这空前的灾难完全是斯大林错判对手与形势造成的，他自己也心中有数。1945 年 5 月 24 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功宴上，斯大林在祝酒词中说：

“我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不仅是因为他们是（苏联的）领导民族，更是因为他们的常智，社会与政治的常智，以及他们的耐受力。我们的政府犯的错误不只是几个，1941-1942 年我们处在绝望的形势中……别的人民会说：见鬼去吧，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另外组织一个政府，它会与德国媾和，让我们得到和平。……但俄罗斯人民没有这么做，他们没有妥协，而是显示了对我们的政府无条件的信任。我再说一遍：我们犯了错误，我们的军队被迫撤退，似乎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但俄罗斯人民有信心，坚持了下来，期望并等待我们将事态控制下来。为了俄罗斯人民显示出来的对我们政府的这一信任，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

毛泽东几曾这么做过？他何时像斯大林那样，意识到自己对全民的责任，知道在犯了重大错误后必须向人民承认，并感谢人民的宽容？相反，他最大的心病，便是大跃进蠢动丢了他的脸，为此殚精竭虑，苦苦思考如何才能在死后仍能堵住悠悠众口，在历史上留下“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把这当成千年大计，最终找到文革这种方式，发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去把敢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抓出来，以绝后患。

据王力披露，毛泽东下决心搞掉刘少奇，乃是因为因为刘少奇在动员社教运动的讲话中说对毛著也不能教条主义，开调查会过时了，不蹲点不能作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等等，江青于是去向毛哭诉，说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就有人作公开报告了。毛因此大怒，准备整刘。陈伯达听到风声，和彭真、陶铸一起去劝刘作自我批评，刘作了检讨，才暂时躲过大难 。毛后来自己对巴卢库承认，他发动文革的念头是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时起的，而刘少奇在那会上说的唯一“出格”的话，无非是“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 5 年、10 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而这在毛听来就是等他死后做秘密报告。为了防患未然，确保青史留名，他便能把全国投入更大的灾难。

毛泽东的第二个性格缺陷是好大喜功、野心勃勃。但凡百战开国的君主，这都是必要的主观素质，本无足怪，但毛的野心实在大到了滑稽的地步。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毛的野心的出格之处，首先是他喜欢豪赌，其赌性远远超过历史上已知的一切赌徒。我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一一列举过毛的军事冒险战略，它们之所以没有招致全党全军的覆灭，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巧合使然，不能不令人怀疑冥冥之

中自有天意。这里只举一例就够了：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竟然电告彭德怀等人："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 准备扔下根据地，从西北万里迢迢打到南京去，还告诉张学良："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的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性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 幸亏西安吃紧，张学良命令红军增援，后来事变又迅速得到和平解决，这伟大的自杀战略才未能付诸实施。

毛的赌博并不限于军事冒险，他更爱搞边缘政策，以不顾一切蛮干、拼个鱼死网破的痞子战略与对方比勇气，逼得对方为怕两败俱伤、大局糜烂而让步。这就是他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打天下时这么干还能理解，但在打下江山来后还嗜赌成癖，就完全成了一种无从理喻的偏执。据王力说，文革初期，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说，如果这次文革失败，他和他们一道坐牢杀头。这话充分表明文革不过是他的一场豪赌，而他把江山和性命都押上去了。守成天子不做，却要去孤注一掷，到底为什么？真是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围。

这种赌博战略具有鲜明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中国特色，对内确有奇效，对外只能贾祸。在抗战中，他反复以内战将使抗战大局崩坏的严重后果讹诈国府，并将这无赖战略讲得清清楚楚："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而蒋介石也确实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听任共军大规模消灭国军而不敢声张。在党内他同样来这一手，当他的倒行逆施引起党内强烈反弹时，他便威胁"上井冈山"，以党分裂的严重后果迫使对方屈服，在 59 年庐山会议上，以及 1967 年的"二月逆流"中，他都以这招吓得全党站在他那边。

但对外玩这套就不灵了，而这彰显了他的野心的又一个滑稽之处——不自量力。他不知道，必须有一定资本才配进赌场，否则只会变成对方的讹诈对象。这就是他与希特勒那个赌徒的本质区别——野心与能力之间横亘着万里长城。两人的野心或许差不多，赌性也差不多，只是无论是论本人的智力还是论本国的国力，他都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斥鴳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最后都只能 "走向反面"，毫无必要地陷国家于危局之中。

中美交恶，中苏交恶，都是他无端招惹来的。每次他都不自量力地蠢动，以边缘政策刺激对方。等到对方给惹恼了，准备对中国实行核打击，他又吃不住劲了，只能灰溜溜地偃旗息鼓，于是每次都成了"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只能靠意淫"反败为胜"。这方面的赫赫战果，当在《国务家•外交篇》介绍。

毛泽东的野心之滑稽，更在于所用的手段彰显的大愚似诈。毛的远大理想，是接斯大林的班，当上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人民的领袖。然而斯大林爬上那把交椅，虽然也靠国际共运教皇的道义资源，主要还是靠传统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亦即以强大武力不断地把疆界往外推移，并把周边国家统统化为帝国势力范围。最终成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天可汗"。这"文治"与武功两手之中，枪杆子才是最重要的。对比一下二战前后苏联的国际威望便足可洞见这一点。

毛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中式 "裂变"去代替苏式 "聚变"，不去效法苏联蚕食

鲸吞周边国家的土地，建立帝国势力范围，却裂土市恩，向几乎一切邻国慷慨地无条件地赠送领土与无量金钱。这种“大公无国”的援助，连明朝皇帝效法蒙古人冒充“天下共主”的水平都没有。明朝皇帝以丰厚的赏赐，引诱周边国家的商人前来“朝贡”，藉此将那些国家算成“藩属”。这虽是自欺欺人，毕竟只是对个人的小恩小惠，并没有向外国赠送领土。而毛泽东裂土市恩、货赂收买的对象，不是转瞬就会被推翻的吴努、苏加诺、恩克鲁玛、西哈努克等人，便是翻脸成仇的金日成、黎笋、尼赫鲁、霍查等人。周边国家非但没有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反倒成了“反华新月形包围圈”。这“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伟大辩证法，更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挣来了“侵略者”的美名。直到今天，中华帝国仍然没有任何势力范围。连毛自己后来都察觉了他的野心与实力的极度不相称，无可奈何地悲叹：“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毛泽东的第三个性格缺陷，是酷爱大手笔，沉溺于轰轰烈烈的大场面的美学迷醉之中不能自拔，对平庸的行政管理工作既无兴趣又无才干，这与斯大林完全是两回事。斯大林不但是战略大师，而且是非常能干的行政管理人才。他是个有名的工作狂，每日批阅的文电车载斗量，时时亲笔修改重要文告，公余还要广泛阅读马列典籍、历史人物传记等等，并详加批点，而且记忆力惊人，连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那种烂书都看过，而且记得内容。

毛泽东则基本不介入行政管理，除了鑽故纸堆外，便是构思轰轰烈烈的大手笔，最喜欢大跃进那种千军万马齐上阵、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大会战。大约在他看来，天下最美的场景，便是人山人海。据李志绥回忆，毛对他说，国庆上天安门观礼是受教育，而李首次看了也觉得很受教育。大跃进期间，他陪毛泽东南巡，沿途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土高炉”集群，入夜火光烛天，大家都深受鼓舞，深感自己正在目睹在祖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总之，在毛泽东，“改天换地”必须是直观的、具体的、轰轰烈烈的、万头攒动的、声势浩大的。这就是他说的“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那其实是一种奇特的美学迷醉，重要的只是形式而非内容，更非结果，要的只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宏大场面给他的强烈快感。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参加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的苏联专家米哈伊尔•科洛奇科（Milhai A. Klochko，也就是前些天老金转来的《南方周末》文章提到的那个后来叛逃到加拿大去的苏联专家）对这种美学表演的感想：

“我完全知道，我从一个土堆铲到另一个土堆去的那几铲土，如果还能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也只会是宣传价值。但在我看来，我上那儿去，如果没有别的好处的话，对周围数百工人来说倒是一个趁机休息一会儿的好机会（芦注：指工人们停下来欢迎他）。当然，我也注意到工人们并没怎么出力，这还算是轻描淡写了。我确信，只需两三百人使用挖掘机和卡车，就能比那几万‘热心的志愿者’干得更快更便宜，因为不必为那些人提供运输、住宿和几周的食物。化学所（芦注：他在北京负责指导的中科院化学所）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类似行业的人也可以持续进行他们的业务工作，用不着把时间浪费在一点装模作样的体力劳动上。”

毛的第四个性格缺陷，是奇特的角色错位。毛有非常强烈的“人民救星”的错觉，

认定他是人民的化身，他的意愿天然代表了草根民众的诉求。这种错觉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中似乎见不到。列宁和斯大林的错觉是他们代表了客观规律，奉行的是特卡乔夫那一套，追根溯源是从卢梭那儿来的，亦即人民群众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何在，必须“强迫他们自由”。而毛泽东不但像传统开国君主那样，认定自己代表“天命”（只是改用“客观规律”的现代表述），而且认定自己是劳苦大众的化身，所想所为都是群众的心意。

这荒唐的错觉，使得他把自己的大手笔当成群众自发的大手笔，认定人民群众也跟他一样，“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人民领袖必须保护这种积极性，“气可鼓而不可泄”，决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这坚定的信仰，使得他在发现自己的大手笔闯了大祸之后，仍然迟迟不想纠正。这倒不能完全归咎于他死要面子，讳疾忌医，择恶固执。据李志绥大夫说，庐山会议前，毛已经发现了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但他生怕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想贸然纠左。我认为这的确符合毛的心理。当然，彭德怀的万言书一上，他的动机就完全不同了。

毛的第五个性格缺陷，是人格分裂，毕生生活在非常醒目的矛盾中，本身就是一种奇特的“对立统一”。例如他一面对西方文化持极度轻蔑的态度，认定中国古书里有解决一切难题的秘诀，另一方面又号召“厚今薄古”、“破旧立新”，对传统表示出更大的轻蔑。他在内部讲话中用讥诮的口吻提到梁思成等人反对拆北京城墙是何等徒劳无益，与胜利者讥笑战败者一般得意，后来更下令全国人民与传统彻底决裂，消灭传统文化。在他领导下，全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焚书斗儒的人民战争，超过了秦始皇一万倍。

又如后文将要讲到的，他的政治理想就是“等贵贱，均贫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再也没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只有忠实的“人民勤务员”。苏联模式之所以让他感到幻灭，无非就是因为离他那朦胧模糊的理想国相距太远。然而他自己却绝不容许任何人与他平等，要求的是绝对服从，连意见分歧都要当成“路线斗争”。

对毛这个特点，杨尚昆看得清清楚楚，说：“毛主席这个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确实如此，看看他那些谈“路线斗争史”的讲话立即就能发现，此人心眼奇小，睚眦必报，正如杨尚昆说的：“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刘英插话：他真是记得清！）这个人在这方面是这样的。所以任弼时如果他不死，‘文化大革命’也非整死不可。”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真是他说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么？

否。五中全会后，毛一直是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委员、政府主席，一直都参加重大军政决策会议，只是在宁都会议后被解除了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那还不算撤职，因为上级给足了他面子：先由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说毛“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两周后才由临时中央任命周兼任该职 。就这么点微不足道的委屈，毛却嚷嚷了几十年，不但在崛起后把所有的上司都整得死去活来，甚至在米高扬 1949 年秘密访问西柏坡时还向他告状，造谣说自己几乎被杀了。然而就这么一个心眼比雀屁眼儿还小的人，却动辄号召：“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跨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这种人格分裂与性格矛盾，赋予他一种深刻的叶公好龙天性，百万右派就是这天性的牺牲品。我多次指出，57 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头并不如大众所想的那样，是深谋远虑的“大鸣大放，挖坑下象”。真实的情况是，毛不满于共党铁腕控制下的万象肃杀，妄想用炼钢炉烧制冰激凌，让猫爪子之下的夜莺唱出动听的歌曲来。他更希望摸索出一种党外监督机制，使得各级党官成为“人民勤务员”，后者其实就是文革的发动原因之一。然而当知识分子们真的被动员起来后，他又受不了了，于是便“因势利导”，把原来颇有诚意的号召化为“引蛇出洞”。

文革期间他又多次显示出这种欲奸无胆、欲罢不能的德行。例如他在文革初期多次谈起巴黎公社委员拿普通工人的工资，并随时可以罢免，给人的印象是他要彻底砸碎国家机器，按巴黎公社模式重新塑造一个出来。这不但哄信了杨小凯等造反派，就连春桥、文元都上了当，把上海的新生红色政权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然而毛立刻又临事而惧，弄出个不良不莠、根本无法运作的“三结合”出来。

类似地，“一月风暴”后，党组织事实上已停止存在，国家由群众组织管理，给人的感觉是毛准备放弃党组织，去摸索一种新的权力机构。但最后他发现还是无法扔掉列宁的发明，于是转过来宣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这种叶公好龙的性格，使得毛出尔反尔，翻云覆雨，响应他的号召或听了他的怂恿的人反倒成了阶级敌人。许多人因而倾向于认为那是毛处心积虑的“拖刀计”。其实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出于毛的性格缺陷，有多少出于毛的阴谋诡计，还真难以断定。他把高岗煽动起来向周恩来和刘少奇发难，然后又倒过去整高岗就是典型例子：到底他是因为斯大林告诉他高岗向他通报中共内部秘密，想藉此诱骗高岗上当，好趁机除掉那里通外国的奸细，还是他想搞掉周而又半道缩手，转而牺牲高岗？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毛的第六个性格缺陷是逆反心理特别强，动辄“老子就是不信邪”。李志绥大夫曾披露，卫士越是劝阻他别干什么，他就偏要干，不但在漂着粪便的珠江里游泳游得兴高采烈，而且偏要到有鲨鱼出没的海滨去游泳。卫士们不敢劝他，只好把打死的鲨鱼放到他必经之地。这貌似勇敢坚定，其实是野蛮痞子的脾性，反映到治国上，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条条，破除清规戒律”、“反潮流”、“开顶风船”，大无畏地藐视客观规律乃至人类最普通的常识，因为它们必然是众口一词的老生常谈，遵循它们显不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英雄气概来。

毛泽东的最后一个性格缺陷是妄想型人格失常（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杨尚昆也指出了这一点，说：“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 。斯大林这毛病比毛似乎还突出，但希特勒似乎并无此特点。这毫不足奇：希特勒是通过和平选举上台的，而共党领袖是从血海里爬上宝座的。在那种无情的筛选中，杯弓蛇影、疑神疑鬼的心理疾患反而变成了“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的主观优势，有利于他们在党内外的权力斗争中胜出。毛与斯虽然同病，却仍有自己独特的滑稽之处。

首先是毛与斯在党内的地位不同。列宁死时，斯大林不过是个二流人物。即使在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布哈林等人，升为一把手后，他的地位仍然不巩固。17 大有两百多名代表没投他的票，还有人去游说基洛夫，让他取代斯大林的位置。正因为此，斯大林才涉嫌暗杀了基洛夫，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大清洗，把几乎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做”成间谍干掉。

毛泽东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他的权威都是不可挑战的。在党外，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强大的政权，把每个子民都牢牢攥在手心里，百姓根本没有造反可能。在党内，延安整风已经奠定了他的教主地位，因此他根本不必担心。

然而毛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却是对自己的事业彻底缺乏必胜信念，因而终生生活在恐惧中，被想象中的牛鬼蛇神团团围住，坚信政权一定会被他们推翻，因此如故李慎之老说的那样，“以小民为敌国”，采取一切措施去揭露并消灭各种各样的假想敌。这种恐惧心态越老越甚，完成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泛化深化过程，亦即先从外围小民开始，越整越多，最后整到最内圈中去，把自己完全搞成了孤家寡人。

早在 50 年代，伟大领袖此疾就已经很严重了，1955 年，他在《人民被日报》上公布了胡风等人的私人通信和日记，在编者按中危言耸听地说什么：

“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便成了建“国”以后他心理疾患第一次大发作的牺牲品，并由此株连到无数“肃反”牺牲者头上去，虚构出来的危险又反过来吓坏了他。所谓“反右斗争”也如此：本来是他的心理疾患使得“鸣放”成了“引蛇出洞”，而引出来的“蛇”又吓坏了他，以致他修改了据说原来颇开明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亦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加上这些危言耸听的话：

“在我国，……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

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此后他又在全国宣传会议上强调：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60 年代他这疾患就开始“由表及里”，锋芒对着自己人了：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到了 1964 年 6 月 8 日，形势便在病人眼中变得极度黑暗：

“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到起草《五一六通知》时，就连中央也出赫鲁晓夫了：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到了 1966 年初，伟大领袖便开始担心政变，据敬爱的林副统帅在是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这是没有完全

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林副接着大谈古今中外政变史，证明伟大领袖并不是犯病，而是作了有充分历史现实依据的伟大战略部署，并向全党大声疾呼：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取得政权已经 16 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着’。‘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

“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 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

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语，正常人一望即知乃是典型疯话，然而伟大领袖却非常赞赏，将之印发全党，作为文革动员的总纲领。毛还钦点陈伯达进驻《人民被日报》，由他亲自执笔，把林副那个讲话写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社论，以疯子的被迫害妄想吹响了文革进军号。

只是毛的心思揣摩得最好、用得最活的林副统帅却万万没想到，他为了论证毛防范彭罗陆杨发动政变的正常性，引用了大量史事，却引起了病人更大的疑心，对敬爱的江阿姨说：

“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可见老人家真是病入膏肓：林副好心出来论证伟大领袖不是无缘无故害疑心病，反而成了专门研究古代政变史，因此居心叵测的罪证！“伴君如伴虎”的原因，乃在于那君王是个严重的精神病人。

天下太太平平本无事，庸人无穷无尽自扰之，毛这种奇特的心虚情怯的僭主心态，

最终“走向反面”。天天担忧“千百万人头落地”，今天怀疑这人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明天说那人是匈牙利的纳吉，反而逼反了原来无限忠于他的袍泽，让他死在一生声望的谷底。这与斯大林完全是两回事。

我想，只有明白毛的这些缺陷，才能实事求是、恰如其份地理解作为“思想家”与国务家的毛泽东。